

2001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

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SUIBI



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

漓江出版社

# 2001

##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

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SUIBI

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1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杜渐坤,陈寿英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2001.12

(年选系列)

ISBN 7-5407-2803-5

I .2... II .杜...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532 号

**2001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

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中核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字数 327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0 册

ISBN 7-5407-2803-5/I·1676

定价: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 编者的话

这是我们为读者编选的第三个年度最佳随笔选本。

和上两个年度选本一样,这一本着重编选的,也仍是带有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性质的,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思想性、文化性随笔。

我们之所以看重这些,之所以看重作品中的独立思考,是因为它对国人的思想解放是大有裨益的。

别的不说,单看选在这里的吴江先生追记二十二年前那场关乎国运民瘼的真理标准讨论的两篇文章吧。假若没有那场讨论,假若没有那些在讨论中敢于独立思考的老一辈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假若没有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建国以来存在的问题,拨乱世而反诸正,也许还会走不少弯路。

因此,印在这一本《随笔》里的许多篇章,它们的值得珍视也是不言自明的。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得不割爱了诸多佳作,这是我们历年来的遗憾。但2001年作家们的思考言说情态,从这一本《随笔》里,也可略窥一斑吧。

杜渐坤 陈寿英

2001年岁末

## 目 录

编者的话/杜渐坤 陈寿英(1)

中国文明如何定位? /资中筠(1)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吴 江(14)

1979 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真理标准讨论第二阶段/吴 江(27)

如何走出? /牧 惠(41)

奴隶语言和奴才语言/王得后(50)

思想与思想者/王文元(56)

特殊年代的精神活动

——“胡风集团”作家的潜在写作/刘志荣(62)

沫沙十年祭/李 普(74)

后摇篮曲/曾昭备(85)

纪念日历/邵燕祥(94)

留在纸上的苍凉

——整理杜高档案随感/李 辉(103)

心沉如铅读遗书/王春来(111)

《思痛录》成书始末/杨 团(114)

一个不能忘却的朋友——范泉/贾植芳(127)

关于周扬的思考/叶 凯(132)

忏悔的随想/朱寿桐(137)

麻雀与曹操/雷 颐(143)

兰亭论辩是怎样的笔墨官司/纪 红(150)

读《鲁迅著作手稿全集》/陈四益(163)

重读遗忘的武训/曾伯炎(169)

反腐二题/舒 展(171)

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朱学勤(176)

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断想/胡长明(180)

风流汉武两千年/金克木(195)

龚自珍之死/李国文(208)

靖康耻与潇洒字/刘长春(218)

佯醉与佯狂/韩静霆(231)

木皮散客贾鳧西/李木生(246)

走 路/林 希(257)

杂议两则/鲍鹏山(263)

多大算老? /蒋子龙(273)

韩非的命运/何满子(276)

反刍《人关告谕》/鄢烈山(280)

关于辫子与革命的零碎故事/张 鸣(283)

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蓝英年(289)

猎人和猎物的历史/袁 晔(308)

甘地的限度/狄 马(311)

心上栽棵含羞草/刘心武(318)

喊叫水/朱增泉(320)

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忧虑/詹克明(325)

读《农政全书》/周同宾(332)

古希腊的石头/冯骥才(342)

情 死/王充闾(347)

石 崇/许 淇(353)

虫豸小品/刘 征(357)

再谈散文

——致葛一敏书/杜渐坤(361)

## 中国文明如何定位？

资中筠

2001 年被联合国定为“不同文明间对话年”。似乎伊朗是这一活动的主角之一，是对话年的发起国。在 2000 年 9 月的文明对话会议上伊朗总统哈塔米作主要发言，有一句话颇有警世的味道：“一个彻头彻尾为政治、军事、经济条件所控制的世界最终不可避免地要破坏环境，摧毁一切精神和艺术的家园……使人的心灵无所依归。”这一倡议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意义，以及伊朗领导人的意图，不是本文的关注点。它引发我深思的是：欧美人认同基督教文明，西亚北非许多民族以伊斯兰文明为旗帜，作为世界公认的几大文明体系之一的中华文明，今天究竟如何定义？真的，今天我国在世界上能自称代表什么样的精神文明呢？

方今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举世瞩目。精神却遇到了危机，民族自性 (national identity) 成了问题。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倾向，重器物轻精神之风达到高峰。从历史上看，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圈：古代中国只重文。风光一时，名传青史的率多是不事生产的文人，那些为建设物质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被列入工匠，除个别例外，其名与学都不传。后来在西方的奇技淫巧前吃了大亏，先进人士大力提倡学习声光电化，在船坚炮利方面急起直追，在这追赶过程中全社会重理工轻人文之风逐渐形成。1949 年以后，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这一趋势更走向极端。高校院系调整明显地发展工科，压缩文科（为方便计，本文提到的文科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文革”中，在大学几乎停办的关键时刻有最高指示曰：“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文科如何，就不言而喻了。今天，知识及其分子理论



上得到重视,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告别了反对一切物质刺激,单凭对一个人一种思想的忠诚枵腹从公的年月,却跳到了登峰造极的物质主义,一切都纳入商品经济,包括本属于精神领域的事物,只有赚钱的功能才被承认。因此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文科表面上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被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有一位史学教授朋友曾告诉笔者,他参加了一次文科教学会议,主持会议的一位教育界负责人指示:“人文要为科技发展服务,没有用的东西少教点!”他只有苦笑。那位负责人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人文有什么用”是最常听到的问话。而所谓有用又是最急功近利的短期物质或政治效应之用。以此衡量,大半文史哲的内容都该取消,或作牵强附会的改造。如今,国人对于器物方面的发展,瞄准国际,紧追慢赶,全民投入,义无反顾;而在精神上却空前迷茫,无所适从,仍然徘徊于自大与自卑之间,反对西化仍是重要口号。但是经历了大张旗鼓的“与一切传统彻底决裂”的中国文化和一代新人,用什么去抵挡西化(姑不论其含义是什么),又用什么载体去承载、挑选和吸收外来文化?

与此并存的是另一极端,动辄以“五千年文明”自诩。既认为文史哲无用,又以文明古国自豪,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实际上中国人足以引以自豪的辉煌的文明主要就是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那时王权还没有完备到能够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有不受拘束的思想自由的时期。斯时也,真是群星灿烂,思想活跃而丰富,千载之下仍感到那智慧的光芒。

20 世纪 90 年代,尊孔之风在我国盛行一时,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反对西化是其政治层面。更多的善良人士是有感于人欲横流,见利忘义,世风日下,想从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夫子遗训中找出路。诚然,载入经典的学说和伦理道德规范支撑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也曾经造就足为全民风范的盛德君子。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孔夫子理想中的施教化的程序。先由君子以身作则,然后对老百姓产生无形的影响,就像风过处草向一个方向低头一样。其实这种教化的程序——由社会精英倡导某种思想和价值观,然后传播开来——是文明传播

的普遍规律，中外皆然。不过在中国不太成功。一是中国太大，教育又从未普及，而且历代实行的是愚民政策，从未让老百姓知其所以然；二是圣人之教到底不是宗教，缺乏超现实的强制力量；三是在中国君主专制，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知识和道德行为都是有等级的，所谓“礼不下庶人”。类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礼教对经常被迫卖儿鬻女典妻的贫苦百姓来说是一种奢侈，如果遵守之只有饿死或自杀。所以作为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从来不曾如想象中那样为一般草民所实施。更重要的是，孔老夫子心目中的君子是道德文章和权力合而为一的。他的理想境界是掌握治国之权的在位者同时也是载道的君子，不但以身作则，而且致力于对子民“齐之以德”。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多数情况下权势与道德是分裂的，而且坚守道德规范的真君子只能一世清贫，往往还要受权势的压制、迫害直至身首异处。能使小人随之而“偃”的“风”常与圣人之道相悖。对绝大多数为文盲的中国农民来说，约束他们的行为的一是信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二是官府的强制和各种因果报应之说（可能小乘佛教更有影响）；三是以各种欺骗手段应付官府，连神也可以贿赂。在特别暴虐的统治下忍无可忍时则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若成而为王，改朝换代，统治与教化脱节的情况依然如故。

深究起来，当前流行的许多对东西文化特征的说法是经不起事实验证的。例如说“西方主纵欲，东方主禁欲”，“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西方重争斗，东方重和谐”，“西方对自然是征服，因而破坏环境，东方有天人合一思想，因而顺应和保护自然”等等，揆诸历史和现实，这些都值得质疑（实际上融为一体的，足以与今天统称为“西方文化”相对的“东方文化”并不存在，所谓“儒家文化圈”连整个东亚也无法涵盖，所以这里“东方”只指中国）。应该说，对人的原始兽性和物欲进行一定的克制，形成道德自律的准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并非哪个民族的特色。强制过分，则扭曲人性；纵欲无度，则社会失序。这方面中国在两个极端之间看不出比西方社会处理得更加成功。追求享受和纵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决不亚于任何国家，只是一则比较隐蔽，没有西方人那么坦率；二则不平等，一方有无限权利，另一方需尽无限义务。例如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决无平等可

言。在两性关系中,单方面要求女子保持贞操,而男子,特别是特权阶级的男子,却可以纵情声色,还传为佳话。古诗词中的名篇名句相当多是描写和美化嫖娼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千古传诵;宋代大词人晏殊的珠玉词几乎全部都是咏宿娼生活的。同性恋也非舶来品,只不过在中国又是以不平等为特点,有一方并非自愿,而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更重要的是,即使这种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其内涵和外延也是模糊的,因势而异,因人而异,其实带有很大的虚伪性。所以历代奸臣往往得逞而忠臣并没有保障,率多下场不妙。历代都宣扬清官,正因为物以稀为贵。事实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是常规。总之,今天的世风日下,怪不得外人,也不是现代化的产物。至少一部分是固有的霉菌病毒在新的气候条件下的肆虐。只要正视一下中国历代连绵不断的以各种名义进行的战争、杀戮、惨不忍睹的酷刑和凶残的民俗、青山绿水变秃岭黄沙的历史,以及今天在世界各国大力保护环境、保护古迹文物之时,我国每天都在发生的,法制禁令为之束手的群众性的自毁家园、消灭历史的行动,就很难自我陶醉于一片田园诗般的以和谐为特征的东方文化之中。当然,“文革”时期达到高潮的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以极为狭隘实用的政治画线代替一切是非善恶标准,以及与现实背道而驰的极端虚伪的说教,更对全民的道德素养和精神依托起了致命的摧毁作用,以至后来一旦失控,出现的是大规模无节制的不择手段的满足一己的贪欲。今天举目望一望握有左右社会之“风”的手段的各种“君子”,再看看应受教化的基层“草民”的现状,而欲从克己复礼中求精神文明,可乎?

百余年来议论不休的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实际就是如何对待西方的冲击和影响。从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基本是一致的。西学当然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源远流长的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且只能产生在欧洲。在这过程中,中国人对西方或主动学习,或被动接受影响,同时也不断予以抵制,只不过不同的社会群体所迎、所拒的方面有所不同。回首前尘,走了长长的一条弯路。无数仁人志士、睿智先贤,以其真知灼见把认识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直到五四一代新人倡导建立新文化,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一针见血地刺到了中

国精神文明的要害和西方文明的精华，从旧文化脱胎到新文化似乎找到了方向，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扬弃和吸收的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在五四以后中国的多难而曲折的现实中，真是“道路阻且长”！今天，中国最缺什么，最需要什么，推什么陈，出什么新？笔者思前想后，不怕重复老生常谈，方今欲重建我中华民族精神的家园，还是得回过头来接着五四的茬走下去。

关于五四精神，80年来海内外已有无数论著掰开揉碎，翻来覆去讨论，然而至今话题常新，因为一联系实践就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要强调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也是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到烂熟以后特别缺乏的部分。鉴于时下较多见的对科学和民主的皮相的理解，我有时想，是否五四还缺一个“人”字头的口号——人本、人道或人文？这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精髓。细想之下，又觉得这是多余的。因为如果正确地、全面地实施科学和民主，人文精神必然贯彻其中。问题恰恰在于理解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最常见的一种是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科技已经约定俗成，导致今日的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知的渴望，是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至于民主，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程序，但重要的也是一种精神，贯穿于全民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二者都是人本的产物，植根于每个人平等的自由意志和对这种意志的尊重，因此个性解放也是五四时期所大力倡导的内容。由此反观中国历史，表面上，古之士与今之商易位，从只重文的极端跳到只见利的极端。但究其实质，两个极端所缺的是同样的东西即超越急功近利的目标的求知求真精神，以及鼓励这种精神使思想得以尽情驰骋的社会氛围。古之士之所以地位高，端在于与仕相通，所以科场失意的白头童生学问再大也是没有地位的，而且也真的无所用其学。学问的价值就在于经世致用，实际是给皇帝出谋划策，得到采纳了才会有用。古来的大知识分子一生中从未做过官的极少，如《后汉书·逸民传》中那些刻意避世的隐逸之士是特例，所以才专门为之立传，他们保持了自己一小方精神独立的天地，也就真的没有用了，对当代和后世都无贡献。而一旦做官，则尽入彀中，当然不

可能再有自己的探索 and 追求。在中国传统的士那里,好像独立和有用是矛盾的。幸亏古之士多数宦途不顺,失意的时候居多,我们才有了这样灿烂的文学艺术遗产。

笔者从明朝方孝孺和意大利布鲁诺的惨死中得到很大启发,并曾以此为文述中西不同的历史轨迹。他们两人的共同点是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宁死不屈,受到惨绝人寰的极刑,是人格力量的榜样。但是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有天壤之别,决定了中西历史不同的轨迹。方孝孺是保他认为是正统的皇太孙(建文)的帝位,反对燕王夺位(即明永乐帝)而死;布鲁诺则是为坚持他认定的科学真理日心说而死。从方被“磔于市”(1402年)到布鲁诺遭烙刑(1600年)的200年间正是欧洲走出中古向近代迈进,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布鲁诺是这场持续的科学革命和人文精神大发扬的过程中的一位烈士,其历史贡献是与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而方孝孺生死以之的是什么呢?永乐帝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自秦汉以降,多少中国士大夫,特别是历朝顾命大臣,正是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和生命,对推动社会前进并无作用。方孝孺死后数百年间,又一次改朝换代,尽管是异族统治,其政体和道统却大同小异。当中国的皇朝历史在封闭中不断循环之时,欧洲文明加炮舰一路扩张开去,直到轰开中国的大门。

我们至今为四大发明而自豪,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中国人数学也不落后,圆周率不是祖冲之最早发现的吗?诚然,中国人如果钻研科学,其能力决不亚于西方人,现在仍然如此,这已无需证实。但是近古之后,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科学不发达也是无需证实的事实。在几千年历史的长河中当然可以找出闪烁的发明的火花。但是没有成气候,没有突破性的发展。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古代中国的哲人不能说没有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和探索,只不过在百家争鸣中能成为显学的还是与政治文化有关的学说,主要是儒与法两家(汉以后虽然“定于一尊”,事实上历代统治者在实践中都是儒法兼用的)。不用等到秦汉,就在战国后期,先哲那种

“究天人之际”的气度已经为高度实用的纵横学所掩盖。当时走红的知识精英是苏秦张仪之流。他们与同时代的策士们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在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他们已经没有理想的追求，不像孔子那样只执著于自己的学说，准备吾道不行就“乘桴浮于海”，而是像兜售货物那样备有几套方案，王道不售就来霸道，还总有上中下三策供选择。他们留下的不朽著作是《战国策》，在那雄辩的辞章中充满了纵横捭阖、权谋计术。其心计之深，思路之复杂，令现代人望尘莫及。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有相同之处。而就在差不多同时（公元前300~200年间），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研究和发明一条一条的数学物理定律，为自己的发现而狂喜。据说他在被入侵的罗马人杀害时还正在埋头演算。不仅是他个人，就以数学而言，在他之前有毕特格拉斯，同时代有著名的欧几里得、阿波罗尼斯等等。其意义不仅在于数学的发达，而是形成一代风气，对求知的迷恋。一个时代什么是显学，高智商的社会精英把智慧用于何处，大体上决定历史的轨迹。中西历史的分野从那时就已开始，或者更早一些。

再进一步说，今天中国的网络英雄辈出，在短短几年中也可以与西方试比高。但是计算机、网络、软件业、数字经济这种带有里程碑性质的新事物、新观念为什么不首先产生于中国？为什么总是在人家先发明之后，我们再急起直追？以后人家说不定又出什么新花样，我们又只得紧追下去。为什么？实际缺乏的还是一种看似抽象的精神。比尔·盖茨今天在中国青年中是英雄、偶像，但是人们在钦羡其积累财富的能力时是否想到他当初首先是出于对电脑的着迷，是一种执着的探索的兴趣，发财只是其结果。这种纯粹出于兴趣的探索精神与阿基米德对数学物理的着迷是一脉相承的。原创性的科学发明和理论的创造依赖的是这种精神。以这种精神而有所发明的人可称为天才，他们创造出某种新的理念（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然后在实用层面分为两支，一用于改造自然，一用于改造社会，亦即技术与实用型的社会科学。如果舍去作为源头的精神而只追求后面的分支，则我们不免永远被动地追赶他人的脚印。

我中华民族早熟早慧，华夏文明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相当成熟，而且的

确博大辉煌。但是过早地失去了天真和童趣,结果多的是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政治文化,少的是超越功利的探索。发展到今天,缺的就是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的傻劲。古希腊人的特洛伊木马计比起孙子兵法和战国的纵横学只能算小儿科。至今在西方词典中作为权术同义词的马基阿维里(machiavelli),其代表作《君主论》要到1513年才出现,那已是明正德年间了(当然《君主论》的意义决不止于权术)。中国的政治文化惟其早熟,其本身也受传统之累。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发明时,中国的君主专制恩威并施手段日益高明,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尽入彀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其结果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涉及政治斗争,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勾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而对全社会作出贡献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唯一出路是做官,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儒家的道与纵横家的术同样是留给后世的思想资源,又都被后世统治者取其所需活学活用。一代一代的大儒在注六经中殚思极虑,而先秦其他诸子却一直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理解和发挥。所以如果吃老本,我们的思想资源也还远没有用尽。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的断裂从五四运动开始,今日的文化危机应归罪于当时对传统的批判过于激烈,并以之与后来的一浪高一浪的思想批判乃至“文革”时达到高潮的“与传统彻底决裂”相提并论。此说大谬。五四的论争中每一个人的言论都可能有过激或欠严谨之处,但是这里谈的是一种笼统的精神,它与后来的政治运动中的批判实难相提并论。这不是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而是本质不同,方向相反。事实上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痛加挞伐的鲁迅等人都是国学修养极深,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的饱学之士。他们决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正因为是从传统文化的熏陶中走出来的,更加深知其弊。他们要挣脱的是已经被推向极致的,达到荒谬程度的道统,是在孔孟

之教的名义下所实行的摧残人性、禁锢思想的礼教和伪善的伦理纲常。由于这种道统是融化在政治文化中，与权势相结合，具有极大的顽固性，而他们这批学人则既无权势又手无寸铁，所以需要以鲜明的、激进的姿态对旧势力予以冲击，以振聋发聩的口号唤起处于麻木状态的民众，“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由此而来。他们并不是吊在半空中，而是立足于深厚的文化沃土上，因而对外来文化能直入核心，撷其精华，消化，吐纳。对于长期在专制统治下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民众，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立足于启蒙教育，是开启民智。无论如何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否则连我们今天这点思想现代化都达不到。这种精神经受住了中国近代特有的曲折多难的历史考验，其中最严峻的是抗日战争。在那民族危亡之秋，于极度险恶和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新旧文化结合最优秀的品格显出了它的力量和韧性，绝大多数知识精英保持了民族气节，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得以在高水平上延续，至今我们仍受其惠。而作为这一事业的骨干的大批教授学者直接间接率多受过五四精神的洗礼。

后之所谓“与一切传统彻底决裂”则在每一个方面都与此相反，那是先把古今中外一切文化遗产扫荡干净，以便实行在“一切领域内全面专政”。所有口号都是凭权势的力量自上而下贯彻的，实际上都为当时的高层政治斗争服务，与文化无关。例如众所周知的“批林批孔”闹剧就是其一。对于民众则是实行愚民政策，保持或回到蒙昧状态，听凭一个人或极少数人代替几亿人读书和思想，令无知者教育改造有知者。顺着这一方向走下去，而欲达科学民主、文明进步，毋乃缘木求鱼乎！这一切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实则决非马克思主义之过，却十足以贬损马克思主义的威望。正因为经历了后一个反传统，包括五四传统，遂导致全民精神贫乏，失去依托。这种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是从未扫清的封建传统的变相复活，在国门再次打开时面对光怪陆离的外来文化或者饥不择食，失去选择和吐纳的能力，或者在人家那里本来是良种如淮南之橘过了江，很快变质。

更有甚者，今天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所谓西方就是当代美国。美国人当年继承了欧洲文明的精华，结合新大陆的特点，发扬光大，推陈出新，



成就其繁荣富强。今天,不能说美国人的优良精神已经丧失殆尽,否则无法保持其如此旺盛的创新能力,并在如此多元化的社会中维持和而不同;但是如今汹涌而来势不可挡的美国文化影响却率多是为美国人自己和世人所诟病的商业文化堕落和腐朽的一面。且不说那铺天盖地而来的演艺娱乐模式,种种低俗到近于粗野的“审美”情趣,超前消费生活方式,以及市场专政带来的拜金主义,就是学术、教育模式传入我国的也不是其自由活泼的特点和通才教育的传统,而是纳入市场供需、高度实用主义、听凭市场选择、服从市场律令的那一面。精神云云所剩无几。再从高层次上讲,开放以来美国的思想库体制对我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影响甚大。这刚好与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合拍,即使不直接做官,也只有向当政者出谋献策而被采纳的学问才算有用。有些大学的领导人就是这样理解文科建设的意义的,“没有用的少数点”由此而来。

美国的思想库的作用如何,以及美国实用与通才教育的消长利弊,笔者另有著述论之,不在本文范围。至少有一点,他们的实用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充分言论自由、多家争鸣的基础上的,方面很广,学派林立,与现行政策相左的论述也可以广为传播,今天不用,明天可能证明其正确。这一条件在我国尚不存在,所以即便在实用层面,思想库的作用也变质为与注六经差不多。不过在这一风气下,也吸引不少士子入彀,正好符合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给独立的人文探索留下的空间就更逼仄了。实际上在反西化的口号下,国人每天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西化,只不过所化率多是皮毛或糟粕,把精华拒之门外。在精神层面恰恰就是五四先驱们所拥抱的饱含人文精神的德赛二先生。本文提出要接着五四的茬走下去,正因为当年贤哲们所吸收的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源头,是以己之精华接纳彼之精华,否则,只能接纳彼之末流。

本文所说五四精神和五四先驱可以理解为一种符号,从广义而言涵盖了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上半期的思想者及其探索和成就。这是一笔极大的精神财富。即使当时不同派别貌似誓不两立的论战,其内核也有相通之处,并且体现了思想活跃,言论自由,在总体上有助于学术文化繁荣进步。如果舍弃了这一思想资源,我们的五千年与现代就真的失去了连接的